

19
中国历代文论选讲

上册

苏宰西

王纘叔

宝鸡师范学院科研处出版



中国历代文论选讲

(上册)

苏宰西 王纘叔

宝鸡师范学院

1985·宝鸡

《中国历代文论选讲》序

胡 征

清人王士禛云：“唐人作集序，例叙其人之道德功业，……千篇一律，殊厌观听”（《香祖笔记》卷六）。近世序文，例非道德功业，而千篇一律之余风，并未销声匿迹。今之为序者，虽难效昌黎、皇甫寔之雅驯，一洗人云亦云之陋习，但欣逢改革新时代，岂甘重囿陈辞？辕固云：“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同），《孙子》：“避实而击虚”（《虚实篇》），《鬼谷子》：“以实取虚”（《本经阴符》）。学分曲正，兵重实虚。治学如治兵，洞察实、虚、曲、正，勇于求索，敏于思辩，或可略避千篇一律之余烈。

《荀子·儒效》：“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积礼义而为君子。”依此推之，可以说：积祖国文化精华而为《中国历代文论选讲》，信不诬矣。

陆士衡《文赋·序》：“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妍蚩好恶，可得而言。”今读《中国历代文论选讲》原稿，颇有同感。历代文论之类的选注本，常有所见，惜乎注多而论少，论深而公允者更是寥寥。纵览苏宰西、王缵叔之书，可谓推论公允，阐发精深之作，非博学之士与严谨学者是殊难胜任的。

所谓推论公允，乃借选发论以正是非的意思。庄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齐物论》），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上》），儒、墨、释、道，是非臧否，各有所执。足见是非之争，古今相望，异代相因，非人力所能喝止的。直至马克思主义出世，是非始有标准可循。马克思主义乃治学治国治天下之最高准则，历史唯物主义乃马克思主义之理论基础。多年来，流行一句誉满天下的名言：“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听其言而必观其行，口称“无所畏惧”实则“有所畏惧”的大有人在。孔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而批判孔子“三畏”最激烈的勇士，其对历史的畏惧，更有甚于孔子之三畏的。而《中国历代文论选讲》真无所畏，仗义正言，一扫三百年来之是非烟瘴，还历史以本来真象，列一代文杰金圣叹入美学之林，与各流派平起平坐，予以公允的科学论述。选此论此，有胆有识，可为历史唯物主义治学精神之佐证。

所谓阐发精深，言其“一褒一贬，字挟风霜”之意。《诗·小雅·鹤鸣》：“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一事一物，观之有远近，论之有浅深，美玉各俱形态，砺石依人磨琢，功夫不负苦心人。《荀子·劝学》：“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古为今用，应将“先王之遗言”改为“祖国文化精华”。

“学，然后知不足。”三复斯言，愿与同好诸友共勉之。

1984年12月于西安吉祥村两仓楼

略谈古代文论的学习与研究（代前言）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从极其遥远的时期起，我们的祖先就在华夏神州这古老而辽阔的土地上，创造着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古代文学理论，便是我们中华民族光采夺目的历史文化遗产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古文论是世界文化史上最长远、最丰富、最优秀的文学理论体系之一。就现存的历史资料来看，早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群经诸子中，就已开始了对艺术的内部和外部规律的探讨，诸如《尚书》的“诗言志，歌咏言”，《论语》的“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孟子》的“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易经》的“修辞立其诚”，《荀子》的“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等等，等等。其中固然有唯物唯心之别，明确朦胧之分，然而正如《孔子家语》所言“夫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终于滚滚不息、万汇合流，演为浩浩荡荡、波澜壮阔、千古奔腾的长河。而在这数千年的古文论的发展史中，荟聚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文学鉴赏的可贵经验，出现了象荀子的《乐论》、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王夫之的《姜斋诗话》、李渔

的《闲情偶寄》、叶燮的《原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等不胜枚举的文论名著，形成了一个富有民族特色的深邃而独特的文学理论体系。

但是，对我们祖先遗留给我们的这一文化宝库的发掘、整理，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研究，直到现在却还是很不够的：解放以来在我国流行的文学理论基本上是苏联的文学理论再加上一些西方文论，就是目前所出的文学理论专著、以及高等院校讲授的文学概论课，不少仍然是苏联三十年代文论的老调新弹，并没有把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精华融进去，更没有形成一个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魄的我国民族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这是很不适应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时代要求的。国有国格，人有人品，我们民族的文学理论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努力吸收外国的优秀的文学理论，但同样毫无疑问，我们也应该保持和发扬自己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不能设想，一个伟大的民族可以让自己有特色的文化消熔在外来文化中，而建立不起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文论体系的。因此，我们现在学习和研究古代文论，首要任务就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对我国古文论独有的范畴和特殊的规律，作认真、深入地探索，把前人总结出来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加以必要的归纳，使之在具体论题上理清来龙去脉，并予以科学的阐发，为逐步创建自己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我们每一个学习和研究古代文论的人不可忽略的重大问题。

早在一百多年前，革命导师马克思在论及法国历史时就

精辟地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那么，我们今天面临创建具有民族特色文学理论体系的历史任务，摆在我们面前的“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又是怎样的？它有哪些内容？它是何种形式？它与其他民族的文学理论（比如西方文论）有怎样的不同？它和我们现时通行的文学理论的关系又如何？种种这些表现中国文学理论自身特点和规律的东西，都是我们不能不首先注意的。

别林斯基说得好，“诗人永远是自己民族精神的代表，以自己民族的眼睛观察事物并按下她的印记的。”（《论人民的诗·第二篇》）而文学的民族性，就是民族性的烙印、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的标记。的确，与世界其他各民族的文学思想相比，我国的文学理论从自己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里生长、发展，带上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印记，形成了极有特色的范畴、体制、观念和表述方法，有着特殊的长处与弱点。这，自然远非这篇短文所能论述，但要而言之，我国的古代文论大致有着这样一些自己的特色：

第一，我国的古文论自始至终都特别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重视文学的道德价值，这是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也是我国古文论的开山者，是位积极于经国治世的政治家，他吸收并总结了春秋以来人们对于文学的零散的认识，将其融化于自己政治思想体系之中，提出了“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的文学为社会、为政治服务的基本纲领。经过孟、荀的

发展，到汉初便形成了一整套所谓“诗教”的学说。诗，即文学，被规定为统治者“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王道教化的工具。此后二千年间，随着孔子的偶像日益尊荣，这一以政教为中心的文学思想，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文论史上著名的刘勰的“原道、徵圣、宗经”三位一体的文学观，韩愈的“道文合一”论，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说，以及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朱熹的“道为文之根本，文为道之枝叶”等等，都是儒家“诗教”说的演绎。乃至影响到文学批评，衡量作品也往往以其经世致用的价值为标准。这便形成了我国古文论重社会价值、重政治效用的第一个特色。这个特点的长处，是指引着我国的文学始终面向社会，执着于人生；而其弱点则在于过分强调文学对政治的依附而妨碍了对文学自身规律的探讨。

第二，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中华民族的初祖，“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中国小说史略》），这一古风影响了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构成，那便是在思维方法上，重视个别的具象的事物而忽略抽象的普遍法则的思考，因此我国古文论，除了如“体大而虑周”的《文心雕龙》等一二有严密系统的理论著作外，其余大多散见于各类哲学、政治、历史、军事、美术、音乐、舞蹈、书法著作以及大量的序跋、书信、诗话词话之中，内容固然是十分丰富，而且其中也确实含蕴了许多闪光的精到的见解，是一笔极可珍贵的理论遗产，然而毕竟多是从个人美感经验出发的直观的印象式的评议，不能对作家和作品作科学的理性的逻辑说明和周密详尽的分析，更不能上升到理论，

归纳出普遍的法则和建立起自己的体系。这一特点的长处是，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文学鉴赏紧密结合，形式活泼，细致入微又丰富多彩，并且重视直接性的审美感受，给读者以启迪，利于调动读者的艺术经验一同参与赏析和领悟；而其弱点是理论性弱，不利于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而且零星分散，勾勒不易。

第三，我国古文论不仅在发展规律上有自己的特点，而且在内容上也有其特殊的思想体系、美学范畴、传统概念和理论术语。比如意境、神韵、风骨、格调、文气、趣韵、兴象、意象、虚实、寄兴、隐秀，以及形与神、情与理、文与道、幻与真、因与革、悟与法等等，都是我国古文论所独具的，而且这些术语的内涵又极其丰富，并且具有多变性。就象贯通古文论各个领域的“文气说”，历来就是众解纷纭。从孟子的“养气”，到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再到苏辙的“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可以养而致”，再到姚鼐的“文字者，犹人之言语也。有气以充之，则其文，虽百世而后，如立其人而与言于此；无气则积字焉而已”，其中的“气”的内涵就各不尽相同。岂但不同朝代和不同作者，即是同一作者在同一著作里运用同一术语也往往各有所指。有人统计过，刘勰的《文心雕龙》五十篇中，就有三十一篇讲到“气”，共八十次；而它的内涵则由作家的精神状态、文章的风格气势乃至时尚风气、万物气象，变化颇多。这是我国古文论又一重要特点。它的长处是民族特色突出，深邃而独到，会极大的丰富和充实世界文论宝库；而其弱点则是，概念、术语往往具有多义性和不定解性，使人难以把握，有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且很难从西方文论和现代

文论中找出对应的概念，增加了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困难。

第四，清代画家松年在《颐园论画》里对中西绘画比较说：“西方画工细求酷肖，……中国作画，专讲笔墨勾勒，全体以气运成，形态自有，神自满足。”中国画的重在传神寄意，其实是我国整个艺术传统的一大特点，表现在文学理论里，就是对文学现象、文学流派、作家与作品，不致力于精密确切的研究和理论上的全面科学评析，而喜欢用轻灵的语言去表现主观的艺术感受，并常常借助比喻手法加以表述，追求一种评析者的心神与艺术对象浑然契合的境界。象严羽对盛唐诗人艺术成就的评介就是：“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张戒对阮籍、陶潜、曹植、杜甫等诗人风格的分辨是：“阮嗣宗诗，专以意胜，陶渊明诗，专以味胜；曹子建诗，专以韵胜，杜子美诗，专以气胜。”这种比拟式的评述，文字优美，形象鲜明，含蕴深隽，读后令人有所得，有所悟，确有其独到的长处。但对作家、作品、风格、流派不展开具体的分析，仅仅点出其特征，而又讲得那么空灵，读者如果不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深厚的修养，是很难参悟到其中的奥妙的。这又是中国古代文论较难普及的弱点之一。

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当然不止这些。在学习和研究古文论时，我们应该尊重自己的民族特色，既不机械搬用西方文论中的某些概念。也不能以今铸古犯黑格尔所指出的：“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那种错误，而一定要对我国古代文论本身以仔细的推求，准确地阐释，探寻其固有的特点与规律；然

后在此基础上和对马列文论、西方文论、现代文论的学习沟通起来，既在“异中求同”，从而认识世界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又在“同中寻异”，从而发现中国文论的特殊表现，认识我国古文论的世界意义和独特贡献，并进而吸收融合，取长补短，建立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的文学理论体系。

目 录

(上 册)

《中国历代文论选讲》序	胡征
略谈古代文论的学习与研究(代前言)	1
第一章 先秦文论概说	1
1、对诗歌性能的认识的形成	2
2、孔子的文艺思想	8
3、孟、荀的文学主张	10
4、墨子的“非乐”观及“三表”说	18
5、老、庄的艺术追求	21
6、韩非的功利主义文艺观	31
第一讲 孔子及《论语》二十则	36
第二讲 庄子及《庄子》二十九则	62
第三讲 荀子及其《乐论》	97
第四讲 《易经》的文艺思想	130
第二章 秦汉文论概说	143
1、汉儒诗歌理论的建立	144
2、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肯定与否定	149
3、围绕汉赋形式主义倾向的文学论争	154
4、扬雄对传统文学思想的发展	157
5、王充的进步的文学主张	159

第五讲	秦汉儒家诗论的总结——《毛诗大序》	167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文论概说	181
1、	本时期文学批评发展轮廓	182
2、	南北朝的文笔说	193
3、	沈约的声律论	197
4、	刘勰及其《文心雕龙》	201
第六讲	曹丕的《典论·论文》	252
第七讲	陆机的《文赋》	271
第八讲	刘勰论艺术想象的专篇《神思》	307
第九讲	刘勰论作家风格的专篇《体性》	326
第十讲	刘勰论文学反映自然的专篇《物色》	347
第十一讲	刘勰论文学批评的专篇《知音》	365
第十二讲	钟嵘的《诗品序》	383

第一章

先秦文论概说

(上古——公元前三世纪)

内容要点：1、对诗歌性能的认识的形成；2、孔子的文艺思想；3、孟、荀的文学主张；4、墨子的“非乐”观及“三表”说；5、老、庄的艺术追求；6、韩非的功利主义创作观。

中国是世界文化发源地之一。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即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就曾出现过群众性的诗歌创作繁盛期，《诗经》则是这一阶段群众创作的记录。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这个数字虽比孔子删定而流传至今的专集大十倍，但还只是一个官方资料或历代流行的说法。实际的数量必然更为可观，由此不难想见当时人们对于诗歌的重视程度了。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奴隶社会日渐衰落而封建社会逐步形成、两种社会形态新旧交替发生急遽变革的历史时期，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演进，人们对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出现的新情况不能不重新思考，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和代表新兴地主利益的两

大政治集团意识形态的对抗，促使诸子学派之间的激烈争论，遂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学术思想蓬勃发展，散文异军突起，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相继驰骋于世；与此同时，南方楚国出现了屈原，他继承《诗经》传统，创作出长篇抒情诗《离骚》，标志着诗歌创作的新时期。文学创作的道路在扩展，这就使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及作品实际产生的社会效果，对文学现象和性能不断获得新的认识，并在自由争辩中相互引发，古文论便由此诞生并发展了。

先秦时期的文论处于萌芽状态。当时文史哲不分，文学观念尚未形成，有关文学批评的言论，散见于经书、史册和诸子文章。从总体来看，《诗经》作者用以表达写诗旨意的诗句，成为“言志”、“美刺”二说形成的先导；孔子的文学见解比较系统，是他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荀子的《乐论》，则是古文论的第一篇专论。这些都为主导古文论发展方向的儒家文艺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于墨、道、法诸家的文学主张，都有其各自的侧重点与特色，虽说比之儒家内容不那么丰富，但道家老庄和法家韩非学派的影响却与儒家三足鼎立，在中国古文论史上逐渐形成不同的文学理论体系，各家的贡献都是不可忽视的。

（一）对诗歌性能的认识的形成

为什么要作诗？这是古文论中最早接触的问题。首先出来回答这一问题的乃是诗作者本人，他们在自己的诗作里公开宣布写作意图，内中就包含了对诗歌性质及功用的朴素的认识。这一点，《诗经》给我们提供了可供研究的线索，如“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君子作

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这是把诗歌作为抒发作者内心深情和对现实感受的说法，揭示出诗是感情化的艺术这一最基本的特性。再如“维在褊心，是以为刺。”

（《魏风·葛屨》）“夫也不良，歌以讯之。”（《陈风·墓门》）“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何人斯》）

“王欲玉汝，是用大谏。”（《大雅·民劳》）“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大雅·丞民》）这是把诗歌作为怨刺和赞美的武器，也就说明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很显然，《诗经》作者在说明为什么写诗问题时，触及了诗的性质及用途，为古文论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诗经》作者的创作体会，在春秋战国时代逐渐被文人们所重视，许多人都试图从理论上予以概括，“诗言志”说便由此而形成。《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荀子·儒效》里说：“诗言是其志也。”《庄子·天下》篇也说：“诗以道志。”这是当时普遍的说法，而能以比较具体地进行论述的，那便是《尚书·尧典》里的一段话：

帝曰：夔！命女（同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乌ū；叹词）！予击石拊（府fú拍）石，百兽率舞。

〔今译：舜帝说：“夔！我任命你掌管音乐，教育孩子们健康成长。让他们正直而又温和，宽宏而又严谨，刚毅而不暴虐，简朴而不傲慢。诗是用

以抒发情志的，把情志长声地吟唱出来，声音的高低服从感情变化，用音律来谐和声调，八种乐器的声音和谱一致，不要相互争强而不伦不类，让天神和庶民都感到和美。”夔说：“好啊！我敲打着石磬谐和乐歌，率领大家跳起传统的百兽舞。”】

过去有人认为这段记载，是古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朱自清《诗言志辨序》），对“诗言志”这一见解给予高度评价，无疑是正确的。从整段文字看，“诗言志”是从诗教的角度提出的，在内容方面，包括教育下一代健康成长“四项德行准则”；在形式方面，要求适合于乐舞，能使人们在“和美”的感化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很显然，这里所说的“志”，是情志，是“感情”和“思想”的统一。班固《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也正是这么理解的。但是，由于儒家把“志”纳入礼教规范，把“情”与政教相对立，因而在实际应用中却并不讲求思想感情的内蕴，而极力把“情”排斥在外。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根据有二：第一，孔子评诗，用“诗无邪”评价《诗经》的思想内容，他所谓的“邪”实际上是指诗作者的“情”，也就是一切不符合封建伦理的人的真实感情，这就无形中抹杀了诗歌最本质的特征；当时各国之间卿大夫从事外交活动的“赋诗言志”，也都偏于曲解诗义而用以表述政治观点；汉儒解诗，更是以政治说教替代艺术规律。第二，自春秋战国到汉代的几部很有影响的儒家评论诗乐的专著，如《荀子·乐论》、《礼记·乐记》、《毛诗大序》等，虽然比较一致地肯定了诗歌抒情言志的特征，但对于“情”的理解却都不免于归之为“天性”，而强